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



发展与代价

DEVELOPMENT AND PAYMENT

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

罗康隆 黄贻修 著

民族出版社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

发展与代价

罗康隆 黄贻修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罗康隆，黄贻修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

(生态人类学研究丛书)

ISBN 7-105-07724-7

I. 发... II. ①罗... ②黄... III. 少数民族—民族发展—研究—中国
IV. D6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3039 号



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

著 者：罗康隆 黄贻修

丛书策划：倩 男

责任编辑：龚黔兰

封面设计：吾 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58130038

010-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e56.com.cn>

投稿邮箱：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迪鑫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8.875

定 价：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罗康隆，1965年生，贵州天柱人，苗族，研究员，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博士，中央民族大



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湖南省民族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湖南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主持国家和联合国教科文项目。主要学术专著有《文化人类学论纲》，《发展与代价》，《发展人类学》，《桃源深处一侗家》，《族际关系论》，《民族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西南与中原》，《民族·文化与生境》等，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研究志趣锁定于生态人类学、文化制衡以及社区发展问题。

黄贻修，1963年生，湖南省溆浦县人，大学毕业，中共湖南省怀化市委党校副校长、怀化行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自1985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近年来主持和参与4项省级科研课题，主



编、参编教材、著作5部。发表理论研究成果二十余篇，其中，《试论农民负担主体的经济资格》、《重新认识自身权力，切实做到有效经营》、《毛泽东减轻农民负担思想及其意义初探》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农业经济》、《工业企业管理》、《毛泽东思想研究》转载。曾先后获“怀化地区优秀教师”（1992年、1993年）、“湖南省优秀教师”（1996年、1999年、2001年）、“中央党校函授教育骨干教师”（2001年）等荣誉称号。

目 录

第一章 发展与发展理论	/ 1
一、对发展观念的反思	/ 1
二、关于发展理论的回顾	/13
三、现代化与现代化理论	/29
四、自我发展的基础及其理论思考	/39
第二章 民族文化的经济体系	/49
一、民族风俗习惯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	/49
二、民族社会组织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	/60
三、民族传统观念与民族经济发展的关系	/73
第三章 科学技术与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	/91
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实质	/91
二、当代科学技术与民族传统知识的冲突	/104
三、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与生态维护	/115
四、地方性知识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	/137
第四章 资源、人口与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	/143
一、资源配置与民族经济发展	/143
二、人力资源与民族经济发展	/155
第五章 国家权力与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	/168
一、国家在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168
二、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状况	/177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意识与民族发展	/183

第六章 少数民族自我发展的政策分析 /215

- 一、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计划与市场 /215
- 二、现有人文环境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225
- 三、文化整体性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的对策 /240

第七章 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理论分析 /251

-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自我发展理论 /251
- 二、二元结构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 /264
- 三、创新理论与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 /279
- 四、少数民族自我发展途径的多元性 /291

第一章 发展与发展理论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发展问题就一直成为地球上各个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始终关注的首要问题。今天，发展问题不仅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范围内社会结构及其各个子结构，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技术结构、资源结构、人力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不断调整与相互推进的进程，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和人类对地球生物圈以及自我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同样成为了人类各个不同民族之间和人类与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之间和谐共处的主旋律。这样一个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共同面临的时代性的焦点话题，促使人们对以往的经济发展观进行反思，以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从本学科的视野出发，对发展的内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和解释。然而何谓发展、发展的含义是什么、发展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历史上或当代各个民族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具有哪些共性与特性、各个民族实现自我发展的基础是什么，这些仍是人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一、对发展观念的反思

对不同的人来说，发展这个词可以代表不同的事物和理念，因此，我们在从事该课题研究之前就有必要来限定或深入探究其含义。离开了这种对于其内在含义的探究和统一的度量标准，我们便难以确定少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自我发展究竟应该从何入手。长期以来，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领域，以至于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发展就是经济发展。这种观念在面对“发展”多大程度上离了谱，也是该课题必须予以说明的内

容。财富的增长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扩散，始终是经济学关心的焦点。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无论他来自何方，他可以对个人财富淡漠视之，却不能不把自己献给这一伟大的追求。经济增长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经济学的尊崇。

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先决条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正如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所言：“环顾当今世界，不论左派右派如何界定，他们的区分不在于发展经济与否，而在于谁的方针能给此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大的希望。但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此目标，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社会主义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自由放任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背离传统是发展之路，有的说重振传统是发展之路，有的说工业化是发展之路，有的说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发展之路，有的说脱钩（de-linking）是发展之路，有的说向世界开放是发展之路。总之，认为发展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方向正确。”^① 发展成为了一种政治话语并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意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或没有能力）反思类似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展是什么？究竟为谁发展或发展什么？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么政治意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视了的重要课题。

发展一词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一切有机现象都有生命或自然发展过程。它们以某种方式开始生命，然后生长或发展，到最后死亡。发展就是这样一种过程。然而，个别有机体的死亡并非物种的灭绝，因为它们会繁殖，会被延续下去。社会经济方面假设的类比也是十分明显的。民族或国家或社会以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开始，然后成长

^① 许宝强、汪辉选编：《发展的幻象》，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或发展。不过，发展后又怎么样呢？探讨的人并不多。比如说，这些实体是否有可能最终灭亡？或者这些种类是否会通过再造的过程而存活下去。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充分探讨这个类比？为什么我们把注意力全集中在序列的中间阶段，被视为常态或畸态的部分，即假设的增长过程。

二是发展的含义通常是“更多”，是一种与其说是生物的，不如说是算术法则的含义。这里的类比不是指有机循环，而是线性，至少是单线的投射。当然，线性的投射可延伸到无限。无限遥不可及，但总是存在的，总可以想象事物增多。今天的拥有无论是什么，明天便可以拥有更多一点。所有的人都需要某些物质以实现自己的人类身份，决定什么是“足够”，有一些客观基础，不发达地区的人们需要拥有足够货品以改善生存；货品的绝对不足和相对过剩都使生活质量非人性化。当然，无限也能使人受害。无限的实质就是虚无。“富人是贪婪的，欲求超过其需求；而这种贪婪正在快速地扩散到穷人中去。一个贪婪的世界只能是分裂的世界，伦理道德堕落，走向野蛮主义。”^① 无穷无尽并不是谁都喜欢的。人类需要用什么方法划出他们的宇宙界限，创造一个有能力管理的环境范围，从而有可能维持控制，这是人类自身必须解决但又十分棘手的问题。

获得“更多”就是发展，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是一切欲望的实现，是享乐与权势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两者的融合。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欲望。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于使这些欲望在社会上首次合法化。“积累，再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主旨，事实上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科学—技术成果创造了人皆可见，因庞大积累并散布世界而产生的壮观景象，让世界人口百分之十至二十的人享受令人瞠目的消费水平。总之，实现无尽积累的梦想不仅合法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貌似可行。但这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它给人类暗示的希望并没有如愿地实现。

发展主义的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比缓慢增长好。“说经济活动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无非是说，除非人们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否则它们就得不到更多的东西。”^② 这种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这本是特定历史的产物。

① L. J. Lebert, *The last Revolution*, New York: Sheed & Ward, 1965, P4.

② W. 阿瑟·刘易斯著，梁小民译：《经济增长理论》，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



但却被看作普泛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富多元的人类需求与自然生态，简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①而忽视了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的多种需求。

有些国家今日的情况比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的以往时期明显富裕得多，例如把一个国家今天的和 50 年或 100 年或 300 年前的情况相比较，或者把一个国家今天的或 50 年或 300 年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名次及在世界排列的名次相比。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某个国家是“已发展”国家，物质方面及政治方面都“较发达”。在这个意义上说，谁实际上发展了？一般说来，我们把西欧的国家加上日本列入“已发展”国家，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归为低度发展国家。这种状况的形成是有其历史背景的，透过对其历史背景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其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

首先，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 16 世纪开始形成，并逐渐地往全球推开，这一过程得以实现，就在于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我们可称之为资本主义商品链的完整生产过程。这些商品链几乎跨越了当时的政治边界，甚至文化边界。从商品链提取的全部剩余从没按剩余的地带公平分配，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其他地带便没有或极少享受到这种剩余，这些地带就成为了所谓的“边缘地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价值剩余的流动就在三个方面使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泾渭分明：资本如何积累、当地生产过程如何在社会上组织起来及新建立的国家如何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于是，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差异也就越来越大。

其次，获取较大部分剩余的模式就是在商品链的某个环节中实现了相对的垄断。垄断能进行是因为生产者在一些环节的技术或组织中占有优势，或因为政治上强加的某种市场限制。不管造成的垄断利益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垄断本身是十分脆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别人也可以“仿效”那些技术或组织方面的优势，或设法破坏政治上强加的市场限制。18 世纪对“国家财富”的关注，从本质上看，就是生产者在意识形态上表达对创造或保持自己的垄断优势，或破坏别人垄断优势的兴趣。其实，所谓的“重商主义”就是这场斗争中一种有组织的、相互倾轧的方式，是中等垄断剩余能力的生产者

① [美]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1~21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设法使用国家机构的影响力，去削弱在其他国家机构的、经济能力较强的对手。“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一国之所得即另一国之所失，并且如果可以假定各国都力争获利，避免失败，那么特殊的商业政策和一般的对外经济政策就变成经济战争的工具。”^① 新生产者赶潮流而大量生产高利润的产品，增加了总产量，破坏了垄断优势，于是市场便反复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停滞不前。而重商主义者的政策谋求透过政治机制推翻他人的优势，而生产者投入生产则谋求透过市场削弱他人的优势。这两种方法并不相互排斥，最终得出的结果则可能一样。商品链中一项垄断被破坏，生产者就会设法营造其他新的垄断优势。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积累中垄断大部分资本，这是惟一可能奏效的办法。我们所说的技术发展，不过是寻求新的垄断优势而已，随之而来的是全新商品链的建立，以往的商品链也必然不断被重组。这种不断重组的过程就是新的垄断实现的过程，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

再次，原位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界，在随后的三个世纪内扩展了。扩展的原因来自内部架构本身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归结为前后相连的一连串事件。主导垄断的破灭，引起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停滞（Kon-dratieff B - phases），每次经济停滞都会引起一系列变化，目的是要恢复世界经济总盈利率以及保持维持不均分配：通过生产的进一步机械化及地域的重新分布，以减低工资成本，从而减低生产成本；进行创新以创造主要的新垄断产品；一部分劳动力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以满足有效需要的增加。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努力主要在于不时地寻求扩大边界，在其进程中并不总是意味着一定能成功。不论在哪儿，人们对并入世界经济作出了反抗，尽管成效不一。特别是因为被并入者所取得的好处，不论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或是文化价值观，并不那么总是具有吸引力。不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从本身内部机制的优势得到好处，创新不断带来回报，其中之一就是军备技术发展，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与世界经济以外的政治架构的军事力量越来越悬殊，甚至实现中央集权的国家也被征服，因此不仅形成了其强权政治，甚至形成霸权话语，以致使那些非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逐渐解体的可能

^① [美]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著，晏智杰等译：《经济思想的成长》，10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性越来越大。

西方工业化过程从特定含义来说就是一个不断并入的过程，回顾历史，其并入的情形已经十分清楚。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某些生产过程被改造，融入世界经济的商品链中。起初，这些被并入的地区融入商品链的三个环节之一：为中心地区的某些加工过程提供原材料——商品作物（包括粮食作物）或矿物产品；增加生产粮食作物，供给边缘地区生产原材料的劳动力；利用当地的剩余粮食，提供食物给那些在特定时期转到原材料或粮食作物生产线（供给原材料生产者）的劳动力。第二方面的改造是把现行的政治结构重组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原来的政治架构或被合并，或被重组，或解体，或创建随意界定的自信结构，不管怎样，关键在于新产生的“国家”（有时是那些叫做“殖民地”的非主权“国家”）要在国际体系下的规则下运作。在内部，他们要维持某种程度的有效治理，以允许商品链运作所需要的流通。但与世界经济中心地区的国家相比，他们又不可能过于强大，以免真正威胁到原来的主要垄断者的利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次扩展，间歇但持续地进行，从17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到19世纪末这种并入过程已经完成，在地球上已没有一个地区处于国际体系之外。

在这样的背景下，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体系虽然没有过去“世界帝国”那样的政治控制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没有‘取得’自身的‘国家发展’而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得到发展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善于积累恰似溅在吸墨纸上的墨水从中心扩散开来”^①。可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由一组很强的“中心国家”和其他较弱的“边缘国家”形成一种政治结构，形成前者在经济上剥削后者、在政治上影响后者的依存关系。

最后，按“发展”的绝对指标来衡量，全部或大多数国家的数据指标都“升”了。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严格来说，这些经济指标均以货币作为量度单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个被界定的经济体内年度的货币流通总量。不过，这些指标却经常被看作能同时反映“福利”、“生活质量”和“进步”的程度，导致

^① [美] 沃勒斯坦著，黄燕莹译：《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15页，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1。

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增长作为发展计划的主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

然而，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反映了哪些经济方面？又掩盖了哪些生计活动？它能真实地反映“福利”和“生活质量”吗？

这些指标是根据某年度内生产出来的货品和劳务以货币衡量的价值，要通过贸易流程，才可以被汇总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之内。因此，那些没有纳入货币流通过程，从而未能被货币衡量价值的产出及劳务，均没有被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之内。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至今仍然没有进入到“市场经济”，其产品和劳务等价值的计算，很难以“货币”的形式进行计算，在国家的经济总量计算过程中，也难以得到真实的体现。这引起了另一严重的问题，在计算国民经济增长时，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导致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移，结果是原来在非货币经济中没有被算入国民生产总值的产出或劳务，在经济货币化后却被算入指标之内，从而高估了工业化或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在统计上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偏好，不单对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造成错觉，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工业化或市场化的过程中，由于仍然采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程度，结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增长”。

此外，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是以总数或平均数算出，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地区或相同地区内不同人群之间的福利状况。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组织在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经济状况时，只能将不同国家的货币折算为一种通用货币（通常是美元）才可进行比较，但在折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汇率，却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或“低估”的现象。换句话说，实际汇率的变动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变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以货币量度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在一些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地区或国家之内，倘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的增长与两极分化同时出现，那么对大部分贫困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没有多大意义。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产值增加了，也不能代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了现代经济”^①。各个地区的统计数据，也不能反映该国不

^①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5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或个人的福利，如国家的人均总值达到 5000 元，这只是一个国家层面上的概数，而具体的不同地区、民族、个体的差异极大，有的可能是 5000 元的几倍，有的还不到五分之一。这种统计数据就无法反映真正的福利。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采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划目标，亦会鼓励较贵重但却不一定是必需的产品的制造。相反，由于技术进步而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却会使国民生产总值减少。因为较贵重的产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费，而产品价格下跌却对穷人有益，这就更使其统计数据不能反映具体国家、地区、民族或个人福利的真正情况。这些指标明显带着不平等的偏见。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但对拥有固存财富——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带来的福利排除在计算以外。举例来说，若我们今年购入一部新的电冰箱，但同时把旧的抛掉，结果是新购的电冰箱的价值被加入国民生产总值内，但被抛掉的旧电冰箱的价值却没有在计算中扣除，结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质福利的提高。更清楚的例子是对自然财富（例如空气、饮用水、森林等）的计算。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内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大量伐树）、对饮用水的污染（如制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学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对空气的污染（减少林木将减少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再免费地享用清新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级市场购买“纯净水”或以其他手段到别的地方享受清新空气（出现“氧吧”），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又或是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来，只有购买昂贵的设备以清除环境污染，这也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值。换句话说，破坏自然的过程反而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多次增值的机会。像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否视为发展？

同样的逻辑亦可应用在人类环境的计算中。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也会像机器般“耗损”——视力衰退、消化系统破坏、思想退化等，但这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一样，也不会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不过，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些“耗损”而兴建的医院和增聘的医疗人员，则被算进国民生产总值之中，结果人类健康的破坏也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如果这样的过程也算是增长的话，那么，人类追

求增长的意义是什么？

美国人类学家塞林斯 (M.Sahlins) 更进一步指出, 所谓资产是财富, 越多便越好, 这种观点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并不适用于原初社会的采猎部族。当采猎地附近的动植物资源差不多耗尽时, 采猎户必然迁移。换句话说, 游牧是采猎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 只有不断流动, 才能维持生计。然而高流动性却与积累资产不能并立。对终日迁移的采猎部族来说, 资产只会变成负担。一方面, 采猎部族面对的物质压力相对地轻, 他们需要的生活资料, 大部分能在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随手获得, 当食物 (野兽) 或水资源渐竭时, 只要转移到另一处地方, 问题便能解决。因此, 对采猎者来说, 并没有必要建立库存, 积谷防饥; 另一方面, 不断迁移使携带资产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苦差, 轻装上阵才能令采猎户的转移流动舒适方便。为了使迁徙过程顺利, 部分采猎户更会刻意毁坏其所“拥有”的大型“资产”, 甚至把不能移动的老弱伤病进行“人道毁灭”。^① 对采猎部族来说, 人生的终极目标绝非不断积累物质资财, 而是得到不用背负沉重包袱的流动自由。

然而, 原初社会的采猎民族的物质生活是否十分匮乏, 处于绝对贫困的水深火热之中? 若从人的欲望无限, 但却受有限资源制约的现代经济学逻辑出发, 答案才会是“对”的。不过, 欲望 (特别是对物质的需求) 无限只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建构, 并非亘古不变的规律, 因此欲望的满足绝不必要透过不断拥有物质财富来实现。减少对物质资财的欲求, 往往能使欲望容易满足, 这正是原初采猎社会的经济逻辑。循此思路, 我们甚至可以说, 资产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是制造贫穷的源头: 若贫穷的意思是物质资财的拥有并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 那么强调 (甚至鼓励) 欲望无限的现代社会, 是无法不无时无刻制造贫穷的。从特定意义上说, “贫穷”是现代社会的特产。相反, 原初社会的部族民虽然没有什么固定的物质资产, 但他们并不贫穷, 因为在他们特殊的社会背景 (采猎经济) 下产生的对物质的欲求, 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容易获得满足的。在一个不以积累资财多寡来确定社会地位的原初社群, “贫穷”自有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 以无穷欲望和物质资财匮乏来衡量的“贫穷”, 只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① [美] 塞林斯:《原初丰裕社会》, 载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 56~77页,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只是从数量上计算福利，但“质”的改变，例如宁静愉快的心境、精神的享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却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这些指标没有把工作能否为人们提供愉快的感觉考虑在内，因此倘若人们因为一些较苦闷的工作职位有较高薪酬而转工，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因而会提高，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未必会改善。

事实上，正如塞林斯指出，原初社会虽然没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的物质消费品，但活在原初社会的人却不用像在工商业社会一样要长时间工作，因此闲暇时间较多。特别是一些居于拥有丰富资源的森林的采猎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时便足够整天的食用，剩下的时间，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还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谈天等现代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他们的生存意义，构造他们的神话，讲述他们的故事，深化他们的文化。我们在侗族社区的田野中，看到侗族同胞在鼓楼内、风雨桥上、杆栏式住屋内或屋檐下悠闲地生活着，无不为之羡慕。我们敢断定他们的生活质量不见得比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人差。荒谬的是，在现代工商业社会“闲暇”备受忽视的同时，“闲暇产业”却在当代蓬勃发展。高尔夫球场、民族文化村、民族生态村、迪斯尼乐园式的大型游乐场等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现代（富）人解决他们的“闲暇”问题。然而，这些能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闲暇产业”，却背负着十分沉重的社会和生态代价。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确实现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目标，然而，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却依然如故。这种状况反映出发展的狭窄定义在某些方面是十分错误的。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起来呼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下台”，发起对广泛存在的绝对贫困、日益增大的收入不平等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的直接进攻。总之，在 70 年代，经济发展在经济增长范围内从减少和消灭贫困、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被重新加以解释。“随增长再分配”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口号。达德利·西斯尔在他的主张中简洁地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问题。“因此，对一个国家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

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①人们对发展的内涵开始了种种质疑。

上述主张既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断，也不是对某种假设状况的描述。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期间取得了相对来说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然而，对于处于这些国家底层的 40% 的人口来说，在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改进，甚至实际上还有所下降。根据早期的增长定义，这些国家是处于发展之中；可按照最近有关贫困、平等和就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却没有发展。到了 80 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转向负增长，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被迫砍掉原本就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形势更进一步恶化了。

但是，发展现象或长期不发达状况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或者对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的数量衡量问题。不发达是世界上 30 亿以上人口实际生活中的严酷事实：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国民贫困状况。正如丹尼斯·古雷特所生动描绘的：“不发达是骇人听闻的，它是所有肮脏、疾病、不必要的死亡和绝望这样一些东西！如果不发达对一个人来说只是反映低收入、住房破旧、夭折或不充分就业的统计数字的话，他是不会懂得它的。即使是最富于感情的观察者，也只有在亲自经受或设身处地地经受了‘不发达的震动’之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问题。当一个人被带入‘贫困的文化’普遍流行的情绪中时，他便会受到这种独特文化的震动。而那些在匮乏中生存的人们，当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既是非人的，又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震动……不发达情况下的普遍情绪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软弱无能感，是当一个人摸索着认识变革时，是慌乱感和无知感；是对控制事态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个人的屈辱感；是在饥饿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绝望感。长期贫困是一种地狱般残酷的东西；当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件客观事物来看待时，很难理解这个地狱究竟有多么的残酷。”^②不发展人类就会陷入困苦的境地，发展总比不发展好，但人类的发展就在于摆脱种种困苦与绝望。

埃德加·欧文斯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除了作为

^① 达德利·希尔斯：《发展的含义》，国际发展协会第 11 届世界大会论文（新德里，1969 年版），2 页。

^② 丹尼斯·古雷特：《痛苦的抉择：发展理论的新概念》，23 页，纽约，埃希尼姆出版社，1971。